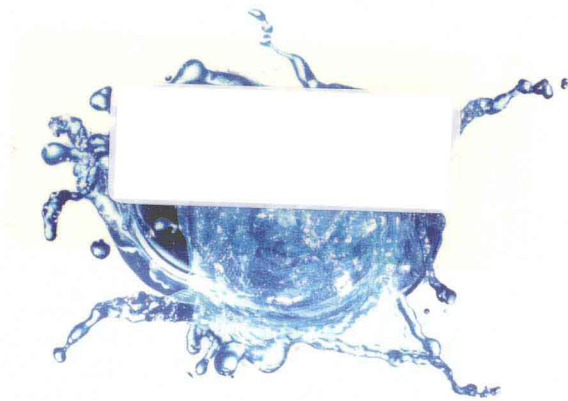


新世纪文艺学建设丛书

主编 钱中文 高建平 刘方喜（执行）

文学， 走向文化的变革

金元浦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文艺学建设丛书

文学， 走向文化的变革

金元浦 著

《新世纪文艺学建设丛书》编委会

主 编：钱中文 高建平 刘方喜（执行）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宁 王先谦 王岳川 朱立元 许 明
刘方喜 李 建 金元浦 周启超 周 宪
姚文放 高建平 高 楠 党圣元 钱中文
徐 岱 陶东风 曹顺庆 童庆炳 蒋述卓
曾繁仁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学, 走向文化的变革 / 金元浦著. --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3.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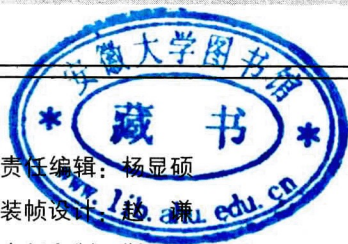
(新世纪文艺学建设丛书 / 钱中文, 高建平主编)

ISBN 978-7-5666-0513-9

I. ①文… II. ①金… III. ①文学研究②文化研究
IV. ①I0②G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9201号

WENXUE ZOUXIANG WENHUA DE BIANGE



责任编辑: 杨显硕

装帧设计: 赵 琳

责任印制: 靳云飞

出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 (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河北天普润印刷厂

开本: 1 / 16 (710mm × 1000mm)

字数: 340千字

印张: 18.25

版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66-0513-9

定价: 45.00元

总 序

新世纪已经过去 10 多个年头了。我国文学理论在“全球化”、“本土化”语境的热议中,度过了不平凡的 10 多年时光。

在这 10 多年间,文学理论领域几乎和上世纪 80 年代初一般,热闹非凡。但与上世纪 80 年代初不同的是,这次文学理论是在文学“死亡”,理论“终结”、“危机”、“凋零”的声浪中,不断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与推动,却是论争不断,新说四起。文学理论不断在更新自己,开拓自己的疆域,扩大自身的内涵,展现自己的新形态,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绩。

这时期出现了几种力求有个新面孔的文学理论新编,多种文学理论专题性的著作,出版了有史论结合、规模宏大的 7 卷本《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有以专题为主的外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丛书,有以马克思存在论思想出发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丛书,有品种繁复的文化诗学丛书,有别开生面的生态文论研究丛书与网络文论丛书,有审美文化理论以及文学人类学这样的新作。这些著作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它们在文学理论、审美文化理论、美学的探索中提出了新思想、新思路,展现了理论的新面貌、新动向。此外还有多种价值取向极为不同的关于新中国成立后 60 年来文学理论史的总结与回顾。可以说,这 10 多年来文学理论的成绩,较之新时期头 20 年,价值取向更趋多元,理论形态更为丰富。

同时我们看到这 10 来年间,不断变幻的外国文化观念大力的输入与引进,一面为我们当今文学理论、美学的建设,提供了不少理论资源,它的反对理论思维的

独断性对我们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继续扩大了我们的视野;而另一方面在文学理论改革的正当要求下,也有对于外国批评理论的过度张扬与紧身的跟随,使得文学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的探讨,处于变幻不定的状态,而日益走向后现代主义的碎片与拼贴,虽然这种情况又是不可避免。面对新的世纪,似乎一切还没有真正开始,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再来!这里既有对当下文学理论处境的焦虑与不安,也有对于文学理论未来命运的期待与展望。

但是,无论焦虑与不安,期待与展望,我们理论界需要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判。首先,文学理论需要加强它的实践品格与时代特色,在求新求变中进行理论创新。当今我们已处于网络文化之中,出现了类型多样、形式新颖的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包括网络文学在内,而使人目不暇接;而一些文学思潮又使人捉摸不定,目迷五色。人们的文艺活动样式也丰富多样,急速变化。面对今天这样复杂而多样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文学理论确实相当滞后,身处窘境。文学理论究竟为何、何为?这一问题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出现过多次讨论,至今不失其理论与实践意义。理论创新需要有前沿性的问题感、现实感与时代感,去理解社会的剧变,文学的转型;需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否则文学理论本身就会断了自己的源头活水。正由于这一原因,文学理论常常受到诟病。需要实事求是地去阐明文学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形态、新倾向,在理论上给以恰当的概括;提出新观点、新见解,使理论有所发现,有所丰富,有所前进。理论具有预言的功能,但它的常态则是去阐明已经发生的现象,确立相对稳定的规则。这就需要以科学的发展思想为指导,努力去了解中外文学、理论的历史与现状,把握那种高屋建瓴的综合能力。当然,面对当今琳琅满目、形态多样的文学现象,也需要有一个不断认识、消化与积淀的过程。需要时时心向实际,同时又要避免当今相当普遍的急功近利的学风。不要期望文学理论再有“轰动效应”,理论创新绝对不是追求轰动效应,以为不断重复就能引起轰动效应,只会制造理论泡沫。

其次,需要反省我国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与本土意识。当今,外国文论的介绍十分普遍,这自然是十分需要的一个方面,但是要防止那种在介绍外国文论时,实际上介绍者已被外国文论所介绍的现象。外国文学理论中那些优秀的著作,自然具有相对的普遍意义的品格,我们阅读它们时总会发现,它们都是针对本国的文学或是文化渊源相近的文学而展开的。例如20世纪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如此,它们国别不同,出发点各异,所以提出了多种问题。因此如何进一步建设具有

我国民族特色和本土化的文学理论,而不是外国文论的各种拼贴,实在值得我们不断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资源十分丰富,在这方面,不少学者已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建议。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是一个艰苦而细致的过程,这是克服自我与他者异见的过程,是在传统与外来影响的交锋中发现新思想的过程。文学理论提供知识,也提供思想。功力深厚的著作,总是伴随着甘坐冷板凳的决心而产生的,这种良好的学风,已经使得一些学者获得了厚重的学术成果。没有理论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与总结,任由感觉的无选择的泛滥,跟随外国学者之后,拿他们的观点去引领我国文学理论的潮流,极有可能成为各种快餐文化与无选择的理论的狂欢。我们倡导理论的多元化,多元化正是理论繁荣的标志,但是无选择性却是需要克服的。

再次,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也要检验我们的著述,是否具有历史感的品格,真诚与诚信的品格。无论理论研究,还是文学史,缺乏深刻的历史感,就会失去真诚与诚信,就会缺乏科学性与理论性,而难以取信于人。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历史感就是论从史出,论史并重,就是重视问题产生的现实性,它的历史文化语境、历史生成及其发展,它的历史传统。历史感要求作者的真诚,在实事求是的理论展开中,使其成果获得科学性,进而获得诚信。对于文学史来说,历史感就是尽可能地显示史实,揭示事实的真实面貌,同样需要论从史出,使之史论相映。真诚是学者的一种主观品格,缺乏真诚,就有可能遮蔽历史真相,就有可能利用外力与话语权,歪曲历史,另有所图。这种恶劣作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中极为普遍的生活风习,克服它们,看来工作相当艰巨。当今某些文艺学史著作,看似史作,实则缺乏历史感,让人感到尚未翻过的历史一页,并不是他们写的那个样子。

新时期开始,我与童庆炳教授合作主编过“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出版了36种著作,显示了改革开放后20年间文学理论的实绩的一个方面,后来由于出版原因而不得不中断了。10多年过去,当今文学理论研究的队伍大为壮大,原来的一批中年学者,如今成绩卓著,已经成为文学理论界的主力,撑起了发展文学理论的重任,而一批年青学者,也极富理论发展的潜力。

在这种态势下,河北大学出版社愿意资助“新世纪文艺学建设丛书”,出版当今活跃在文学理论研究界的老中青各类学者的著作,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自由讨论、相互切磋、各抒己见的平台,这对于文学理论界来说,真是一大善举,这种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巨大鼓励,必将推动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出版社的这种魄力与目光,是

令我们深为感佩的。

当今文学理论介入的领域实在太多,但是中心问题是文学理论中的“国际视域”与“中国问题”。我们本着过去表述过的主导、多样、鉴别、创新的原则,在国际视域、传统资源与中国问题的相互激荡中,推动与建设动态的、多样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汇入我国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洪流之中。

钱中文

2013年6月

代前言 对文学意义的追寻

——金元浦教授访谈

金元浦 郭持华

郭持华：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创立的哲学解释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您认为，当代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可以从解释学那里得到哪些启示？

金元浦：解释学给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启示是，我们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从一定的视域去理解和认识对象，换句话说，人类对于对象世界的认识与解释总是以一种有限的框架去对无限时空中生生不息的对象世界予以框定。比如在文学研究中，任何一个研究者、解释者都不可能以清明无染的“白板”状态去“忠实”地反映生活或映照文学作品本身，而必然以一种前理解状态或前理解构架进入理解与研究。一个文学研究主体的前理解构架，既包括文学基本知识的储备，文学研究范式及已有成果的深刻把握，更包括一种由当下历史语境所决定的问题意识。我们的社会现实对文化、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什么新的问题？文化、文学又是如何通过自身的显著变化来应对的？一个理论家、批评家应该带着问题意识进入阐释与研究，开始自己的言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具有鲜明的当下性和实践性。

其次，更具体一点说，解释学有关文本意义生成的理论探讨，为我们重新思考文学作品的意义提供了启发。一部作品有什么样的意义？当我们解读《诗经》时，究竟是理解诗作者的意图，还是理解《诗经》对于今天的我们表达了什么？我们能否复原诗作者的意图？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文学解释学研究的核心。

郭持华：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由什么来决定，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传统文艺学曾

郭持华:这里也许有福柯所讲的那种权力对思想、对真理产生的影响,权力、真理与思想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组织关系,彼此求证而又相互支持。

金元浦:对。人类的文学活动从来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历史发展之外。历史流传物之为历史流传物,就是因为它在历史中流传,它的意义、地位与价值的变动必然要受到各种历史因素的深刻影响。各种权威话语或者政治力量一般通过作用于阐释者的解释立场、目的、前理解构架与视域范围,最终影响到作品意义的生成。

郭持华:汉儒对《诗经》的阐释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例证。统治者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帝国的意识形态,使《诗经》的研究与阐发成为一种御用学术,甚至成为选拔官员考试的依据,这必然深刻影响到儒生的解释立场,他们按照经世致用的原则来解释诗三百,从每一首诗中解读出伦理、政治教化的意义就并不奇怪了。

金元浦:在中国文化史中,漫长而复杂的《诗经》解释历史,确实为我们深入了解历史流传物的意义生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它至少包括了下述问题:

其一,一个历史流传物的意义生成与它的解释语境有何关系?比如孔子在礼坏乐崩的语境中阐释《诗经》,汉儒在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阐释《诗经》,古史辨派在中外文化碰撞的语境中阐释《诗经》,他们分别揭示出来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

其二,一个历史流传物的意义生成与社会权威话语、政治力量有何关系?比如《诗经》是如何从一个“里巷歌谣”的世俗文本升华为垂范万世的神圣文本的?在尊经与非经斗争,守序与废序对峙的背后,是否有权力的影子?权力是如何介入这一过程,最终影响到《诗经》意义生成的?

其三,历史流传物意义生成的多元性。在数千年的《诗经》阐释历史中,古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语言解释的方法、历史解释的方法、心理解释的方法,进入到诗三百的文本解读,得出了各种各样的诗本义、引申义、象征——隐喻义、附会义等等。

其四,文学作品可能在历史流传中经历一个一般作品的经典化、去经典化、再经典化的过程。《诗经》经过孔子的阐释之后,生成了“思无邪”的伦理教育意义,从此被纳入儒家思想体系而成为儒家的经典;汉儒则进一步把《诗经》牵引向政治,充

意思是强调语言就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但是,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来反思这一命题。如果说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那么,语言能否表征存在?语言能否表征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整个世界呢?我认为,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思考语言与文学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

依我看,人类语言的表征是有限度的。语言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概括性和普遍性去把握生生不息的世界、具体鲜活的现实人生,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文学艺术活动中由审美体验带来的那种奄忽缥缈的直觉、微妙倘恍的感受、绵远朦胧的神思、曲致玲珑的情感、玄深幽微的哲理等等,它们的丰富性远远超过了语言的丰富性。所以我们经常可以从作家那里看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妙处难与君说”等等诸如此类的慨叹。这种艺术体验的丰富性与语言的局限性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带来了人类表征的危机,但同时也造就了人类艺术表达的技巧:暗示、空白、隐喻、象征等等,从而形成了文学文本的未定性与意义空白,为读者创造性地解读文本、参与对话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人类语言自身是有历史性的限制的。只要我们打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封闭系统,把语言放到无限延伸的历史过程中来观照,我们便可以发现,语言总是在历史时空中不断漂移、变革、传释的。语言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生生不息的运动与变化,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漂移中,语言必然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意义的变化:或者是产生了意义超载,新的环境赋予了语言以新的含意;或者产生了意义的缺失,语言离开它原来的特定使用环境后,自然地失去了某种意义。这样,处在时空网络中的阐释者与文本之间,存在着多重语言阻隔或变异。不同历史时空中的读者阅读文本时,对话双方所操持的语言可能存在阻隔与冲突,并只能通过冲突的融合来达到意义的把握。所以,语言在历史中漂移的开放性,必然造成理解过程中文学意义的未定性和创造性。

郭持华:您刚才提到,语言在历史漂移中产生了意义的超载或者缺失,我想,这种情况可能特别地适用于我们对一个历史流传文本的阐释,由于语言能指和所指的变化,可能造成文本意义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有明确系统的解释学理论,但从源远流长的典籍阐释传统中衍生出来的训诂学,主要就是解决古今语言的差异与历史变化,用当下语言去激活古代语言,以便于理解和解释。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历史流传的文本,比如文学史上的作品,它与我们当代阐释者之间的阻隔和距离不仅体现在语言的层面上,还可能体现在文化的层面上。

比如《诗经》，在孔子那里，它是一部道德伦理教化的读本，在汉儒那里，它是王朝意识形态的纲领性文件，在顾颉刚的古史辨派那里，它又成了文学的经典。它的意义永远在历史中开放，似乎是不确定的。其实，这种历史开放性中又包含了确定性，因为这几种阐释，不仅有自身成立的合法性，而且在一定历史时间、空间内获得了相当大的学术共同体的认可。

郭持华：如何来判断一个解释是合法而有效的呢？《诗经》在漫长的历史流传过程中，曾经先后以不同的历史图像存在，比如伦理教化的文本、帝国资政之书、文学经典文本，这些不同的历史图像都合法而有效吗？

金元浦：简单地说，对文学传统的理解与解释是否合法而有效，取决于阐释者是否敏锐地把握到了当下历史文化语境的核心问题，是否立足于这一问题去扣问和聆听传统的应答。

今天的学者常常慨叹于汉儒对《诗经》的解释为何那样断章取义或主观臆断，其实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可算是相当合理的解释。儒家诗教在确定《诗经》经典地位的同时就确定了它为封建王权、为德政伦理教化服务的基本宗旨。虽然《诗经》这一先秦的文本没有变化，但阐释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改变，阐释的意图、目标、指向已大大改变，因而阐释出来的意义必然发生大大改变。汉儒通过经学化的阐释，高扬《诗经》中的伦理、政治教化意义，这与汉代王权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语境是吻合的，因而在当时获得了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可，也就是一种对《诗经》合法而有效的解释。

郭持华：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历史流传物意义生成的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它获得了较大的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同？

金元浦：在理想的状态下，情况确实如此。对历史流传物的某种解释，如果合法而有效，就有可能赢得越来越多的学术共同体的接受、认可，从而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成为普遍的、确定的、标准的阐释。

这种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可，是通过相互间的对话与交流来完成的。文学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交流的本体存在，是一种主体间的存在。在文学活动包含的诸种要素中，作者与作者、作者与读者、作者与文本、文本与文本、文本与读者、读者

比如《诗经》，在孔子那里，它是一部道德伦理教化的读本，在汉儒那里，它是王朝意识形态的纲领性文件，在顾颉刚的古史辨派那里，它又成了文学的经典。它的意义永远在历史中开放，似乎是不确定的。其实，这种历史开放性中又包含了确定性，因为这几种阐释，不仅有自身成立的合法性，而且在一定历史时间、空间内获得了相当大的学术共同体的认可。

郭持华：如何来判断一个解释是合法而有效的呢？《诗经》在漫长的历史流传过程中，曾经先后以不同的历史图像存在，比如伦理教化的文本、帝国资政之书、文学经典文本，这些不同的历史图像都合法而有效吗？

金元浦：简单地说，对文学传统的理解与解释是否合法而有效，取决于阐释者是否敏锐地把握到了当下历史文化语境的核心问题，是否立足于这一问题去扣问和聆听传统的应答。

今天的学者常常慨叹于汉儒对《诗经》的解释为何那样断章取义或主观臆断，其实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可算是相当合理的解释。儒家诗教在确定《诗经》经典地位的同时就确定了它为封建王权、为德政伦理教化服务的基本宗旨。虽然《诗经》这一先秦的文本没有变化，但阐释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改变，阐释的意图、目标、指向已大大改变，因而阐释出来的意义必然发生大大改变。汉儒通过经学化的阐释，高扬《诗经》中的伦理、政治教化意义，这与汉代王权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语境是吻合的，因而在当时获得了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可，也就是一种对《诗经》合法而有效的解释。

郭持华：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历史流传物意义生成的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它获得了较大的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同？

金元浦：在理想的状态下，情况确实如此。对历史流传物的某种解释，如果合法而有效，就有可能赢得越来越多的学术共同体的接受、认可，从而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成为普遍的、确定的、标准的阐释。

这种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可，是通过相互间的对话与交流来完成的。文学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交流的本体存在，是一种主体间的存在。在文学活动包含的诸种要素中，作者与作者、作者与读者、作者与文本、文本与文本、文本与读者、读者

意思是强调语言就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但是,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来反思这一命题。如果说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那么,语言能否表征存在?语言能否表征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整个世界呢?我认为,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思考语言与文学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

依我看,人类语言的表征是有限度的。语言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概括性和普遍性去把握生生不息的世界、具体鲜活的现实人生,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文学艺术活动中由审美体验带来的那种奄忽缥缈的直觉、微妙倘恍的感受、绵远朦胧的神思、曲致玲珑的情感、玄深幽微的哲理等等,它们的丰富性远远超过了语言的丰富性。所以我们经常可以从作家那里看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妙处难与君说”等等诸如此类的慨叹。这种艺术体验的丰富性与语言的局限性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带来了人类表征的危机,但同时也造就了人类艺术表达的技巧:暗示、空白、隐喻、象征等等,从而形成了文学文本的未定性与意义空白,为读者创造性地解读文本、参与对话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人类语言自身是有历史性的限制的。只要我们打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封闭系统,把语言放到无限延伸的历史过程中来观照,我们便可以发现,语言总是在历史时空中不断漂移、变革、传释的。语言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生生不息的运动与变化,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漂移中,语言必然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意义的变化:或者是产生了意义超载,新的环境赋予了语言以新的含意;或者产生了意义的缺失,语言离开它原来的特定使用环境后,自然地失去了某种意义。这样,处在时空网络中的阐释者与文本之间,存在着多重语言阻隔或变异。不同历史时空中的读者阅读文本时,对话双方所操持的语言可能存在阻隔与冲突,并只能通过冲突的融合来达到意义的把握。所以,语言在历史中漂移的开放性,必然造成理解过程中文学意义的未定性和创造性。

郭持华:您刚才提到,语言在历史漂移中产生了意义的超载或者缺失,我想,这种情况可能特别地适用于我们对一个历史流传文本的阐释,由于语言能指和所指的变化,可能造成文本意义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有明确系统的解释学理论,但从源远流长的典籍阐释传统中衍生出来的训诂学,主要就是解决古今语言的差异与历史变化,用当下语言去激活古代语言,以便于理解和解释。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历史流传的文本,比如文学史上的作品,它与我们当代阐释者之间的阻隔和距离不仅体现在语言的层面上,还可能体现在文化的层面上。

郭持华:这里也许有福柯所讲的那种权力对思想、对真理产生的影响,权力、真理与思想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组织关系,彼此求证而又相互支持。

金元浦:对。人类的文学活动从来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历史发展之外。历史流传物之为历史流传物,就是因为它在历史中流传,它的意义、地位与价值的变动必然要受到各种历史因素的深刻影响。各种权威话语或者政治力量一般通过作用于阐释者的解释立场、目的、前理解构架与视域范围,最终影响到作品意义的生成。

郭持华:汉儒对《诗经》的阐释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例证。统治者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帝国的意识形态,使《诗经》的研究与阐发成为一种御用学术,甚至成为选拔官员考试的依据,这必然深刻影响到儒生的解释立场,他们按照经世致用的原则来解释诗三百,从每一首诗中解读出伦理、政治教化的意义就并不奇怪了。

金元浦:在中国文化史中,漫长而复杂的《诗经》解释历史,确实为我们深入了解历史流传物的意义生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它至少包括了下述问题:

其一,一个历史流传物的意义生成与它的解释语境有何关系?比如孔子在礼坏乐崩的语境中阐释《诗经》,汉儒在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阐释《诗经》,古史辨派在中外文化碰撞的语境中阐释《诗经》,他们分别揭示出来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

其二,一个历史流传物的意义生成与社会权威话语、政治力量有何关系?比如《诗经》是如何从一个“里巷歌谣”的世俗文本升华为垂范万世的神圣文本的?在尊经与非经斗争,守序与废序对峙的背后,是否有权力的影子?权力是如何介入这一过程,最终影响到《诗经》意义生成的?

其三,历史流传物意义生成的多元性。在数千年的《诗经》阐释历史中,古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语言解释的方法、历史解释的方法、心理解释的方法,进入到诗三百的文本解读,得出了各种各样的诗本义、引申义、象征——隐喻义、附会义等等。

其四,文学作品可能在历史流传中经历一个一般作品的经典化、去经典化、再经典化的过程。《诗经》经过孔子的阐释之后,生成了“思无邪”的伦理教育意义,从此被纳入儒家思想体系而成为儒家的经典;汉儒则进一步把《诗经》牵引向政治,充

代前言 对文学意义的追寻

——金元浦教授访谈

金元浦 郭持华

郭持华：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创立的哲学解释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您认为，当代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可以从解释学那里得到哪些启示？

金元浦：解释学给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启示是，我们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从一定的视域去理解和认识对象，换句话说，人类对于对象世界的认识与解释总是以一种有限的框架去对无限时空中生生不息的对象世界予以框定。比如在文学研究中，任何一个研究者、解释者都不可能以清明无染的“白板”状态去“忠实”地反映生活或映照文学作品本身，而必然以一种前理解状态或前理解构架进入理解与研究。一个文学研究主体的前理解构架，既包括文学基本知识的储备，文学研究范式及已有成果的深刻把握，更包括一种由当下历史语境所决定的问题意识。我们的社会现实对文化、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什么新的问题？文化、文学又是如何通过自身的显著变化来应对的？一个理论家、批评家应该带着问题意识进入阐释与研究，开始自己的言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具有鲜明的当下性和实践性。

其次，更具体一点说，解释学有关文本意义生成的理论探讨，为我们重新思考文学作品的意义提供了启发。一部作品有什么样的意义？当我们解读《诗经》时，究竟是理解诗作者的意图，还是理解《诗经》对于今天的我们表达了什么？我们能否复原诗作者的意图？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文学解释学研究的核心。

郭持华：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由什么来决定，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传统文艺学曾

时期发生。而原有经典作品的再经典化则是在新语境下原作品的意义潜能得到再度开发,依照新的范式又生成了新的意义的结果。任何一部作品要想成为经典,都必须与当代人的生活和精神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只能通过批评家、阐释者对原作品的新的阐释获得新的意义来实现。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再经典化。再经典化将再度经历经典化的历史流程。不过这一次有一个过去遗留下来解构物作为再经典的参照系,其再经典化的过程必然是对那一参照系的反拨。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像《圣经》和《诗经》这种典籍的经典化、去经典化、再经典化的过程从来就没有停止,因此它们的意义是无数阐释的群集,它们自身也是无数经典的群集。

郭持华: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目 录

代前言 对文学意义的追寻

——金元浦教授访谈 (1)

第一编

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 (3)

革新一种思路

——当代文艺学的问题域 (17)

文学意义的范式观与解释学循环 (34)

转向:处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

——兼论贝斯特、凯尔纳的《后现代转向》 (39)

论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 (64)

中国新世纪文艺学的变革与发展 (73)

批判理论的再兴

——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及其理论 (90)

论文艺与经济 (99)

文艺学、诗学与巴赫金

——俄罗斯当代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论的相关讨论 (113)

第二编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历史性登场 (127)

文化研究有未来吗?

——这的确是个问题 (144)